

试用时不知录用条件,被辞退不知因为什么,无故辞退得不到任何补偿……记者采访 20 名保安护运行业劳动者,听他们讲述自己的遭遇——

## 一直在当“试用工” 被辞只因“不合适”

### 焦点

本报记者 刘 旭

“不迟到,不早退,没出过一次事故,还有半个月就能转正,可无缘无故就把我辞退了。”9月11日,54岁的王云凯向《工人日报》记者提起自己的遭遇时抽泣起来。

今年3月,王云凯应聘到沈阳市某护运公司从事短途跟单员工作,签订3年合同,试用期6个月,月工资5500元。8月31日,公司突然告知他下个月不用来上班,原因只有一句“不合适”。

这是王云凯两年内第三次因“不合适”在试用期内被解雇。

9月3日~11日,记者采访长途跟单员、短途跟单员、银行护卫员、企业保安等20名保安护运行业劳动者,他们中的一些人讲述各自遭遇:试用时不讲录用条件,无故辞退得不到赔偿,签订“霸王条款”。

#### 两年内三次无故被辞退

2016年7月,在某银行沈阳大东支行当保安25天,无故被辞退,拿到报酬2500元,没有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2017年3月,在另一家银行沈阳浑南支行当保安44天,拿到报酬2948元,没赔偿。

2018年8月,到沈阳某电器企业从事短途跟单员133天,这是离试用期结束最近的一次,结果再次被辞退——这是王云凯两年内三次在试用期内被辞退的经历。

王云凯是从黑龙江到沈阳务工的农民工。他

告诉记者,多次辞退让他认为自己不够优秀,越是这样,他在下一份工作中就越努力,脏活累活抢着干,每天晚走10分钟整理好休息室的杂物……

第二份工作前,用人单位与他签订了“试用期合约”。“合约规定了不许有打架、醉酒、盗窃、以权谋私等不良行为,不许违背法律法规。可录用条件是啥,啥算考核合格,这些都没说清楚。每次辞退我也没说出具体的理由,就说我不合适。”王云凯愤愤不平地说。

徐寿福、李秀梅、陈颖等13人有着和王云凯类似的遭遇。他们告诉记者,无故被辞退的同行还有更多。

3月12日,50岁的姚成仁应聘到大连市某护运公司从事银行护卫员工作,与单位签订了3年劳动合同,试用期6个月,月工资2800元。7月19日,姚成仁去上班时,发现自己被辞退了,公司没给他任何理由。

姚成仁在大连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的帮助下申请了劳动仲裁。大连市沙河口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给出明确说法:用人单位在试用期内无理由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属于违法。

仲裁委裁决依据是劳动法第25条,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同时,根据劳动合同法第21条规定,用人单位在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说明理由。

#### 保安护运行业成“重灾区”

记者随机调查了运输、餐饮、商贸、建筑、保安护运等行业100名劳动者(每个行业20人),收回问卷98份,遭遇过试用期内无故被辞退的人数分别为3人、2人、5人、1人、14人。为何保安护运行业高于其他行业?

大连市某护运公司总经理谢奇道出缘由:行业门槛低,无需培训,两天就会干,辞退后重新招聘的成本低。

谢奇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雇1个保安签合同3年,试用期6个月,试用月薪2240元,正式月薪2800元,工资成本共计9.74万元。市场上保安、护运员供大于求,前一个没辞退后一个就能补上。理想状态下,如果连续用多个“试用工”,不到6个月就辞退,成本最多能节省1.68万元。

用人单位一般只要求劳动者尽职尽责,至于其更换是否频繁并不在意。本溪某保安服务公司工作人员任飞强透露说:“我们会先找好顶替者,告知劳动者称用人单位认为他不合适。同时告知用人单位,劳动者家里有事,生病或者不爱干了。用人单位一般不会管我们公司内部的事,即使劳动者找到用人单位询问理由,用人单位也会让劳动者找我们沟通,而10个劳动者至少有9个不会索要赔偿。”

记者采访的20名保安护运行业员工中,19人认为,试用期内被用人单位无故辞退不合情理,但应该是合规合法,“否则企业怎敢肆无忌惮去做?”徐寿福便是其中之一。

徐寿福先后签过五六次试用期合约,每次签约对象不同,但合约中都有一条就是试用期考核不合格的可以辞退且没有赔偿。印象中,工作23年来,他从来没被告知过“录用条件”,更没看到过书面的“录用条件”。最长的一份工作干了5年半,试用期刚结束领导就通知他转正了,工资涨了20%,其余几次都被无故辞退。有的公司向他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更多的只是口头通知“不合适”。

更多劳动者被迫同意试用期合约中的“霸王条款”,怕被骗,陈颖每次签合同都会仔细读一遍。他发现所签试用期合约中第12条规定,单位有权在试用期内与员工解除劳动合同且不给任何补偿。“当时不是没有过顾虑,只是不签就别想入职,为保住工作,



#### 拆除违建别墅

9月13日,西安,59台破碎机连续撞击着违建别墅的主体墙面,一排排别墅的主体结构逐渐被拆除。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别墅项目占地面积461.34亩,将土地的性质从旅游用地变成了住宅用地,属于违建项目。

袁景智 摄

#### 云南省高院发布反规避反抗拒反消极协助执行典型案例

## 镇政府失信镇长被取消人大代表候选人资格

**本报讯**(记者黄榆)镇政府失信,镇长被取消人大代表候选人资格;某国有企业不履行还款义务,被多部门联合惩戒;法院已把土地承包经营权查封,被执行人仍偷偷挖被查封土地上的中药材……云南省高院近日举行反规避执行、反抗拒执行、反消极协助执行案例发布会,向社会发布10件典型案例。

2017年8月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某镇政府支付一家建筑公司的工程款及利息,但该镇政府未在规定时间内履行义务。2017年11月,曲靖市罗平县法院将该镇政府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法定代表人、镇长被取消曲靖市人大代表候选人资格。在联合惩戒的压力下,该镇政府归还了部分案款,并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其余案款将于年底前付清。

玉溪市华宁县某国有企业长期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还款义务,与申请人达成执行和解协

议后,又毁约不按协议履行。玉溪中院冻结了该企业银行账户,并将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同时,将情况通报给玉溪市委组织部等相关部门。最终,该企业法定代表人在公务出行及职务变动过程中屡屡受到限制,今年1月企业履行了还款义务。

据介绍,云南全省需要执行的案件每年在4.5万至5万起之间,执行不了的案件大约占25%。其中,有15%的案件执行不了是因为当事人规避执行,约为1500件至2000件。

云南省高院副院长田成有分析了规避执行的表现形式:有的被执行人隐匿、转移或变卖财产,造成资产状况不明的假象;有的与执行人员搞“躲猫猫”,使执行文书无法送达;有的搞假离婚、假诉讼,恶意处分名下财产;有的企业通过改制、破产、虚设子公司甚至开多头公司,公款私存,甲款乙存来转移财

产,逃避债务。还有的企业利用特殊背景、身份来干扰执行。

同时云南省高院还公布了反规避执行的7大措施,包括法院加强与社会各界沟通联系,加大执行宣传力度;在强化、发现被执行人及其财产的手段上下功夫;加大规避执行制裁力度;动员全社会力量,发动群众积极举报;建立反规避执行的长效、稳固机制等。田成有强调,被执行人是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有“特殊身份”的企业法人时,要遵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决不姑息迁就。如遇到“特殊主体”规避、干扰执行的案件,采取提级执行、异地法院交叉执行、上级法院督办执行,法人代表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单位规避执行的,可以以司法建议方式向其所在的人大常委会、政协机关反映,情况严重的,建议取消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身份、资格。

法院执行工作中,除了被执行人耍赖、执行人手不够等困难,法官称——

## “让法院头疼的,还有大量执行不能案件”

原状,法院给予必要的支持,所需费用通过诉讼的形式要求被执行人支付。就这样,一桩执行案件,一波三折,耗费了四五年的时间。

面对解决执行难的顽疾,司法部门可谓绞尽脑汁,执行难,究竟难在哪里?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将其概括为“被执行人难找,执行财产难寻,协助执行难求,应执行财产难动、特殊主体难碰”5种情形。

除了被执行人耍赖,执行工作还面临其他难点。“以前执行难,难在很难查到被执行人的财产。”重庆江北区人民法院一执行法官告诉记者,目前,法院已经跟银行、土地、房产、证券、车管所等多个部门建立了信息查询平台,“现在财产是好了找,让法院头疼的,还有大量执行不能案件。”

该法官介绍说,所谓执行不能,即被执行人确无财产执行,或者法院已最大限度利用已有的资源进

行查控,并对被执行人采取了限制高消费、列入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措施,案件仍然执行无果,只能待发现新的财产线索后再启动执行。

对此,重庆一劳务公司的负责人文勇深有体会。文勇的公司曾给重庆某县的一个村修建了一条公路,当工程完工后,还有40余万元的工程款未支付,法院判决该村支付相应尾款。

然而,该村属于贫困村,账户上并无多少资金,法院多次想办法执行此案,但经过数年的调查、跟踪发现,该村确实没有能力支付这40余万元。该案只能被列入“执行不能”,到现在都没解决。

重庆一位刚退休的法官陈明则认为,执行工作还有一个难点是“案多人少”。他说,大量案件涌入法院,但法院的手极为有限,跟不上需要。“执行局的工作,加班是常态,不加班是例外。”

也只能同意。”

#### 无故辞退咋能肆无忌惮

“劳动者无故被辞退的关键就是没有明确的录用条件。”沈阳大全律师事务所律师燕说。她建议,相关法律应该规定用人单位口头或书面告知劳动者录用条件,如果符合录用条件或岗位考核指标合格的就应当予以录用,不得无故辞退。

谢奇则认为,明确录取条件实际中难操作。“除了学历、性别、年龄、身体状况等硬性指标外,许多软性指标是没法做明文规定的。”谢奇说,“比如,有的用人单位喜欢话少勤快的保安,有的单位喜欢个子高、长相好的,有的单位喜欢外地没家室的,可这些如何能写在录取条件中?如果条条框框都规定出来,那怎能选到合适的员工呢?”

大连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职工维权律师王金海建议,政府进一步完善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备案制度,不规范的企业实行评优、优惠政策等一票否决制度。“合理的制度能规范企业合理用工,尝试形成企业解除劳动合同时还要向上级人事部门备案缘由、劳动者签字认可的制度。相关部门进行抽查回访,对造假企业进行处罚,自然没有企业敢肆无忌惮无故辞退劳动者了。”

辽宁社会科学界学会研究所所长王磊认为,企业长期用“试用工”节省成本其实并不划算。“人员流动大,管理成本就增加了,人事专员要不断招新人,思虑如何辞‘旧人’,企业难壮大,也不利于行业良性发展。”

王磊呼吁,企业生财有道,想做大做强,小伎俩不可取,“应该在员工培养上做文章,培育出更多的‘金牌保安’,选择该保安公司的企业也会增多。需求多了,盈利自然增加。”

(王云凯、谢奇、任飞强为化名)

“僵尸企业”突然“复活”,大肆向外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涉案金额近千亿元

## 公安部指挥打掉25个特大虚开增值税发票团伙

**本报讯**(记者卢越)记者9月12日从公安部获悉,近日,公安部组织指挥上海、天津、广东、辽宁、河北5省市公安机关,在当地税务部门的配合下,对25个虚开增值税发票职业犯罪团伙进行统一收网、集中打击,共抓获犯罪嫌疑人304名,捣毁虚开发票窝点53个,初步统计涉案金额近千亿元。这是近年来公安机关破获的涉案嫌疑人最多、犯罪链条最长、涉案金额最大的涉税犯罪案件。

今年6月,上海、广东、深圳等地公安机关在工作中发现,大量长期处于“非正常”状态的企业突然“复活”,并大肆向外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对此,公安部在税务机关和人民银行等部门的支持下,迅速组织力量开展分析研判,逐渐查明了一个由25个职业化犯罪团伙组成、跨多个地区的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网络。

据介绍,公安机关侦查发现,2018年2月以来,以犯罪嫌疑人杨某、陈某为首的2个犯罪团伙,分别在上海、深圳等地低价收购“僵尸”公司,并雇佣他人领取发票后将公司高价倒卖,短时间内即倒卖公司2600余家。以犯罪嫌疑人付某某、张某某、詹某、谢某、刘某等人为首的多个虚开、洗票团伙,在天津、上海、广东、河北、辽宁、浙江等多个省市实施虚开,开票量巨大、犯罪链条长、隐秘程度高,严重危害了税收征管秩序。鉴于案情重大,公安部统一指挥上海、天津、广东、辽宁、河北5地公安机关开展集中收网行动,一举破获全案。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全国公安机关将按照四部门两年专项工作部署,与税务等部门密切配合,依法严厉打击“假企业”虚开发票和“假出口”骗取退税等涉税违法犯罪,切实维护国家税收秩序和税收安全,努力营造公平稳定的营商环境。

今年是“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决胜之年,各地法院亮出了“十八般武艺”解决执行难,其中,“智慧执行”几乎是所有法院都在研究的“招数”。重庆司法界人士告诉记者,从实践效果来看,单靠人力、“蛮力”推进执行工作,效果并不理想,因此,结合信息时代的特点,很多法院借力大数据打造“智慧执行”,其中,针对执行不能案件,人民法院每隔一段时间都会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询一次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对于符合恢复执行条件的,执行法院将依职权主动恢复执行。如果申请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随时可以再次申请执行。

此外,法律界人士还认为,破解执行难问题,打击“老赖”同样是重中之重,一方面要不断增加“老赖”的耍赖成本,另一方面,还要完善司法救助制度,推动设立专项的执行救助基金。

## 山东严打“土霸王”严惩“套路贷”

**本报讯**(记者丛民)记者日前从山东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山东已累计侦办涉黑案件46起、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238起;侦办涉恶类共同犯罪案件2099起,破获各类刑事案件6311起,查处涉案资产16.5亿元,1078名涉黑涉恶人员投案自首。

据了解,山东省公安厅举报中心平均每天接听举报电话110余次,收到举报信件20余封。为此,山东公安机关还建立健全多警种、多渠道、常态化的线索摸排机制,聚焦重点行业、领域、部位,不间断地开展摸排,广辟线索渠道来源,严格筛查各类线索,不断提升成果转化率。目前山东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全部成立线索核查工作专班,建立线索快速核查机制,对群众举报线索立即接查,事不过夜,做到快处理、快核查、快回复,确保所有线索按期“清零”。

此外,山东公安机关还开展了“铁拳”“金剑”集中行动,目前已打击处理了一大批侵蚀基层政权、欺行霸市、欺压百姓的“土霸王”;依法严惩扰乱金融秩序、侵占公私财物的“套路贷”黑恶团伙43个,查扣涉黑资产9.7亿余元。

## 东莞处理一涉信访群体性劳资纠纷执行案

**本报讯**(通讯员黄彩华 陈天文 记者叶小钟 实习生姚谢欣)广东东莞市一家公司倒闭,欠下工人工资及经济补偿金等共约1000万元,工人们为此多次信访和上访。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厚街法庭执行干警依法迅速对该厂采取财产保全措施,评估拍卖。9月11日,厚街法庭召集工人们到法庭办理领款手续,全部执行案件顺利执结。9月12日,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通报了这一重大涉信访群体性劳资纠纷执行案。

2018年5月,位于东莞市厚街镇涌口村的东莞伟腾五金塑胶有限公司因经营不善,欠薪多日,引发工人们集体上访,继而停业关门。随后,工人们纷纷提起劳动仲裁,个别劳工人向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提起了劳资纠纷诉讼。而公司老板避不见人。经劳动仲裁部门、法院迅速积极协调和主持调解,仲裁调解书和法院民事调解书确认该公司欠下203名工人工资共205万余元,经济补偿金共804万余元。2018年6月,工人们到厚街法庭申请强制执行。厚街法庭迅速对伟腾五金公司进行了财产保全,并快速启动评估和拍卖手续。8月17日,法院对伟腾五金公司的财产进行了拍卖,得拍卖款339万余元。9月11日,在厚街法庭的安排下,约200名工人办理了领款手续。

## 长春诈骗团伙盯上初高中学生银行卡

**本报讯**(记者柳姗姗 通讯员杨昆 刘欣悦)近日,长春市公安局九台区公安分局侦破以“冒充公检法”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特大系列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12名,涉案资金高达3000余万元。该案中,犯罪嫌疑人大量收购银行卡,且对象多为初高中在校生。

今年6月10日,九台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获得线索,张某通过微信群和朋友圈发布大量收购银行卡信息,对象多为初高中在校生。警方通过网络伪装身份与张某取得联系。张某称一张有身份证复印件、绑定电话卡、银行卡U盾,可通过网银大额转账的一类卡可卖800元。张某透露,买来的卡是用来电话诈骗别人打款用的,并同意见面交易银行卡。6月21日,民警在约定地点将其抓获。经审讯,张某如实供述了自己在九台区区内大量收购银行卡高价出售给上线刘某,并于前几日曾在江苏省泰州市一租用的居民楼内,与刘某等10余人通过电脑对电诈赃款网银转账操作的事实。

专案组赶赴泰州实施抓捕,该窝点的12名涉案成员全部落网。经审查,嫌疑人交代了以某某等为骨干,在电脑上以网银转账方式转移赃款,并大量收购他人银行卡出售给上线,用来冒充“公检法”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诈骗的犯罪事实。已掌握证据显示,本案涉及全国多地500余名受害人。